

* [中国侠文化]

西南大学学报 今古传奇武侠版 合办

主持人:韩云波

主持人语:2006年,大陆新武侠的出版和创作都可谓达到了“鼎盛”,但“鼎盛”并不代表高水平,某种意义上主要是数量的泡沫,创作心态和赏评心态都有某种浮躁。刚刚获得黄易武侠文学奖的凤歌,就深感当下武侠创作道路上的孤寂。而作为大陆新武侠领军阵地的《今古传奇武侠版》目前也存在着一个转折,然而,究竟是向哪一边转以及如何转,却让人费尽思量。2007年2月下旬,凤歌从他的家乡奉节,也就是曾让诗圣杜甫留下了许多不朽篇章的古夔州,回到《今古传奇武侠版》履新,出任主编一职,许多读者都对此寄予厚望,而除了《沧海》的连载一枝独秀之外,武侠世界给人的感觉终究还是“蜀中无大将”。2004年7月,本栏目开办(当时名为“21世纪中国侠文化”),次年初,汤哲声教授即在本栏目撰文提出,武侠小说到了今天,“写人”已经不再是武侠小说创新的突破口,应该更多角度、更多层次地演绎各类文化。但是,如何“写文化”,他当时却并未细说。本栏目一直注意拓展中国侠文化的研究领域,注意将其延伸到古今中外的广大地域和不同时段,注意延伸到多学科多文化的人类知识领域。本期栏目的三篇文章就是从差异

极大的三个不同角度立论的,而且都同时将目光投向了比武侠小说本身更加广大的文化空间。其中,刘飞滨的文章从中国传统文化立论,虽然现存汉末建安时代的游侠诗数量并不多,但却依然是汉末三国那个“勇侠”(当时,魏国人鱼豢著《魏略》,其中有《勇侠传》)时代的折光,而从儒家角度来理解游侠,这是侠文化向着主流文化提升的开始。秦宇慧是较早“潜水”于网络的,现在她进入学院来研究网络武侠的历时变迁,有许多第一手资料和切身体验,其文章自然别有一番天地,论述了作为新传媒的网络对于武侠小说的重大影响。吴安新的专业是法学,他从法理学角度对“侠”做阐释,提出了侠的实质是“私力救济”的观点,虽然论述还不够深入细致,但意义是重要的,这就犹如罗尔斯提出“正义论”那样的角度,对“侠”的深层次的伦理功能和社会结构功能进行剖析,如果进一步沿此思路展开,也许会有助于对我们长期纠缠不清的关于武侠小说和侠文化之道德评价迷雾的澄清。总之,本期的三篇文章,其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当下武侠文化以及武侠小说的提升,正有待于中国侠文化之各类文化研究的深入。

建安游侠诗与儒家精神

刘飞滨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游侠诗于建安时期进入士人手中,从现存数量极为有限的作品来看,主要表现为诗人对游侠形象的写实和理想化改造的并存。建安诗人表面上描写游侠,歌唱游侠,其精神实质则是借这一特殊形象表达他们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慷慨入世之情。建安诗人虽然很多时候表现出或力行霸道、或崇尚玄虚、或放浪形骸的行为,但是思想主流却依然是儒家的东西。所以,从儒家思想出发解读建安游侠诗是合乎情理的。

关键词:建安;游侠诗;入世情怀;儒家精神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677(2007)03-0029-06

游侠诗滥觞于汉代的游侠歌谣,而于建安时期进入士人手中,开启了源远流长的发展历程,成为文

学史上非常重要的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游侠诗的专门研究文章已有数十篇之多,本文在

* 收稿日期:2006-05-26

作者简介:刘飞滨(1972-),男,陕西户县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

现有成果基础上,从整体上检讨建安游侠诗。建安游侠诗虽然数量极为有限,但游侠形象的塑造为后来者薪火相传,其积极刚健的入世情怀更是沾溉千古,体认建安游侠诗及其精神实质,意义颇为深远。

一

建安游侠诗现仅存四首完整作品和一残篇,分别为王粲《咏史》其二、阮瑀《咏史》其三、曹植《名都篇》、《白马篇》和《结客篇》。王、阮作品写实色彩浓厚,表现出初创特点。而曹植作品则有艺术上的加工创造,标志着游侠诗在其初创阶段即已有了成熟表现。

王粲《咏史》^{[1]88}其二云:

荆轲为燕使,送者盈水滨。缟素易水上,涕泣不可挥。

诗写易水送别,《史记·刺客列传》:“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2]2534}王粲诗真实地呈现了当时的历史场面。荆轲的身份、送行之人及送别时众人的穿戴、情感的悲痛等等均本乎史实。就风格而言,乃直陈其事,质朴无华。

阮瑀《咏史》^{[1]159}其三云:

燕丹养勇士,荆轲为上宾。图尽擢匕首,长驱西入秦。素车驾白马,相送易水津。渐离击筑歌,悲声感路人。举座同咨嗟,叹气若青云。

此诗亦写易水送别,不过较之王粲诗更为详尽。开篇两句介绍燕太子丹和荆轲之间的特殊关系,二人虽有主宾之别,荆轲却被太子丹视为上宾而礼遇有加。这一情况,亦史有所载。《史记·刺客列传》载,燕太子丹“尊荆卿为上卿,舍上舍”,“日造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2]2531}。第三句以下是对易水送别场面的真实描述。除了王粲诗中所涉内容外,还交代了荆轲此行的目的——“长驱西入秦”,以及为实现这一目的所采用的方法——“图尽擢匕首”,同时又有对“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这一重要细节的描写。另外,由于运用了夸张比喻手法,如“悲声感路人”、“叹气若青云”等,使得诗歌中明显有浓烈的悲壮气氛。不过,总体言之,全诗所写基本上还是囿于史实,其悲壮气氛以及某些感情因素,乃史实本身所具,非诗人有意生发。

不同于王、阮二人的写实,曹植在诗中根据自己的思想情感需要将游侠形象精神化,使之成为他抒情言志的极好凭借。《名都篇》^{[3]484}云: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宝剑直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驰骋未能半,双兔过我前。揽弓捷鸣镝,长驱上南山。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观者咸称善,众工归我妍。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脍鲤膾胎虾,炮鳖炙熊蹯。鸣俦啸匹侣,列坐竟长筵。连翩击鞠壤,巧捷唯万端。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

诗中塑造了一位京洛少年形象。他轻捷劲健,骑术高超,箭法过人,斗鸡走马,驰骋狩猎,很是潇洒俊爽。游侠的英勇精神和非凡武艺于他身上完美聚集。但这又不是一个普通的江湖游侠。他穿戴华贵、生活优裕、地位颇高,显然具有贵公子的身份。在他的身上散发着青春的气息。他虽然面对“白日西南驰”的景象而生发出“光景不可攀”的感叹,但是“即使是享乐、颓丧、忧郁、悲伤,也仍然闪烁着青春、自由和欢乐”^{[4]126}。结合曹植的性情与身份,这位少年可谓作者自己的理想化身。《白马篇》^{[3]411}亦云: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催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猿猴,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胡虏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右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寄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从精神气度来看,此诗应是曹植早年所作。“幽并游侠儿”武艺高强,身怀绝技,勇猛过人,平日里驰骋江湖,行侠仗义,当边事紧急之时,他毅然决然“捐躯赴国难”,精神气节可歌可泣。从客观上看,曹植于诗歌中让游侠从江湖步入边塞,把个人行为纳入了国家行为轨道,在游侠诗创作上是一种创造,表现出了新的特色。主观上看,他让游侠立功边关,表现了其建功立业、垂名后世的强烈思想感情。曹植让游侠跳出了“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价值观念而肩负起了建功立业的伟大使命,树立了“士为报国而死”的新的价值观念。曹植的情感是激切的,而他把这一情感寄寓在一个武艺高强、身手不凡的英武侠少身上,诗中充溢着“一种丰满的、

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4]126}。现仅存四句的《结客篇》^{[3]541}云：

结客少年场，报怨洛北芒。利剑鸣手中，一击而尸僵。

因残缺而难于直接获知诗意的最终指向。但据“结客篇”这一游侠乐府诗题本身可作出相应推断。《结客篇》为《结客少年场行》之别题，创制于曹魏时期，主旨是“言轻生重义，慷慨以立功名也”。据此可知，上述残句应在诗歌前半部分，其后当有对游侠少年慷慨立功之抒写，其主题、结构及手法应与《白马篇》一致。

关于建安游侠诗，虽然目前仅见有限的几首，但据相关情况来看，其创作在当时似乎不应如此萧条。建安时期，侠风泛起，社会上尚武好侠之风颇为浓厚，必然给士人的游侠诗创作营造一种社会氛围，影响所及绝非个别诗人，这从曹魏上层人物诗歌对勇武精神的热烈歌颂即可窥一斑。曹植自不必说，曹丕、曹睿两位帝王也是如此。曹丕诗（佚题）^{[5]404}：“行行游且猎，且猎路南隅。弯我乌号弓，骋我纤骊驹。走者贯锋镝，伏者值戈矛。白日未及移，收获三十余。”描写军士狩猎，流露出对英勇武力的极大欣赏。曹睿《堂上行》^{[5]417}：“武夫怀勇毅，勒马于中原。干戈森若林，长剑奋无前。”赞颂冲锋陷阵的战士，其勇猛无畏、壮烈在怀，令人油然而生崇敬之意！上者所倡，下必和之。可以推知，颂扬勇武精神的诗歌在建安时期为数自当不少。同时，这样的内容于当时出现在乐府中似乎也能说明同样的道理。勇武精神很容易与游侠相勾连，那么，在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对勇武精神的崇尚自然很容易让人在创作中联想到游侠，产生一定数量的游侠诗。

建安游侠诗开创了一个新的题材领域，也开创了一种新的抒情方式。此后，在中国诗歌史上便出现了一首首动人的英雄赞歌，也出现了一种诗人们思想感情和精神风貌的独特展现。

二

建安游侠诗为后世树立了一个风标，这不仅表现为一种充满阳刚之气、撼人心魄而又丰厚鲜活的新型题材对人们的巨大吸引力，更重要的是表现为一种强烈的精神感召力。诗人表面上是在描写游侠、歌唱游侠，实质则是借以表达他们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慷慨入世之情。根据风格差别可将现存作品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王粲、阮瑀的诗歌。慷慨悲凉，荡人

心魂，与建安诗歌总体精神一致。这与“易水送别”本身的悲壮性、诗人精神气质及其所处的特殊时代环境等都有重要关联。而要深入体认其精神内质，则需从建安诗歌精神的全面观照入手。

建安诗歌，慷慨悲凉。外在感受上给人一种心灵上的冲击与震撼，内在实质则主要表现出当世诗人思想感情上的两大主要特征，即对于现实的不尽忧叹和对生命的深沉感念。

建安诗人忧时伤世之情在作品中有突出表现。董卓之乱令诗人感慨万千，曹操一方面对朝廷任人不善深表沉痛，所谓“惟汉二十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另一方面对董卓倒行逆施愤然指斥，“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6]5}。对战乱所造成的万户萧疏、民不聊生，他也不无切肤之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6]6}王粲亦有同调，《七哀诗》：“出门无所见，白骨避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目不忍睹之乱世惨景让诗人“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1]86}。《从军行》其五也是悲从中来，不可断绝：“四望无烟火，但见林与丘。城郭生荆棘，蹊径无所由。萑蒲竟广泽，葭苇夹长流。”^{[1]91}在对满目疮痍的描写中更有无尽的凄凉，痛击肝肺。蔡琰《悲愤诗》所言更觉悱恻：“斩歼无子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迢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捶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5]200}诗人以其亲身见闻悲切地描述了战乱带来的生灵涂炭惨景，令人目眦欲绝，毫发上指。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建安诗人感事忧时，回肠荡气，体现在诗歌中，便是一种慷慨悲凉之气。

建安诗人在感念时事的同时，对个体生命的嗟叹也相当强烈。蔡琰《悲愤诗》描述她从匈奴回归故园以后的情景：“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远眺望，魂神忽飞逝。奄若寿命尽，旁人相宽大。为复强视息，虽生何聊赖。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劬厉。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在经历巨大伤痛之后，诗人心中蓄满了愤懑和忧愁，感觉自己神魂飞逝，仿佛寿命已尽。对生的疲惫和意义的消逝，使其再嫁之后的生活更多地是萦绕着恐惧，时常感慨

“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5]199}。蔡琰的浩叹源于个人遭遇，其实，建安诗人的此类情感，甚至于在嗟怜风月、池苑狎戏、叙述恩荣酣宴的游宴诗中也是如此。曹丕《于玄武陂作》记游写景，却于结句说“忘忧共容与，畅此千秋情”^{[5]400}，旨归在于忧叹中表现出对个体生命的珍视。曹植《筌篲引》写宴享宾客，前半部分精彩地描绘了宴会的丰盛和气氛的融洽，最后却写道：“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时不再来，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3]459}在生活的一片华美中有着对时光流逝、生命终将有的深沉思索。此等诗例，不一而足。建安诗人对于个体生命的观照是普遍的，有明显的两个结点：一是忧，一是叹。在对生命的忧叹中透露出浓重的悲凉之意，在对生命的叹息中散发出浓烈的慨然之气。

从慷慨悲凉，从浩叹感怀，我们看到的是建安诗人的融入和关切。面对社会的破败，他们忧愁、怅惘，悲痛不已。破败的社会使其个体生命更多地散发出忧伤和嗟叹，但他们却并没有因此而放弃热情。诗人们是在以丰富的感情热爱着生活，热爱着生命。这样的情感，理性地看，正是儒家入世思想的显现。那么，以此为基点，王粲和阮瑀的游侠诗就不难理解了。其作品表面上看是面对历史的无限感叹，而深层去看，则是诗人于历史感叹中抒写着儒家思想影响下的社会人生深切关怀。

第二类是曹植的游侠诗。这类诗歌意气风发，充溢着青春劲健的生命活力和昂扬奋进的积极精神。《名都篇》展现的是一个身手不凡、倜傥潇洒的游侠少年形象，他的生活自由多彩，饱含热情，令人钦羨。他虽然也有“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的刹那那间淡淡的黯然之感，但总体上传达的是青春的热烈和生命的欢乐。这位游侠少年对生活的态度实际上折射出了曹植本人的生活追求，那就是生命的不甘沉默。显然，这种对生活的激情拥抱也是儒家社会关怀的映现。如果说《名都篇》反映了曹植面对生活的基本态度，那么《白马篇》则透射出充满激情的人生理想，这是他在较高层次上与儒家精神的会合。《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之不朽。”^{[7]1088}建功立业是儒家不朽人生的追求之一。曹植在创作中让游侠从江湖走向边关去报国杀敌、建功立业，正是这一积极要求的生动表白。

曹植受儒家思想影响而表现出浓厚的奋进精神是颇具代表性的。建安是乱世，也是进取的时代。纷乱的世界激发起了诗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和功业欲望，他们希望一展才华，流芳千古。曹操《短歌行》慨叹人生如朝露，转瞬即逝，在有生之年希望聚集四海之英，一统天下，成就大业。功业在怀而思贤若渴，豪情壮志跃然纸上，这一情怀到了晚年也没有衰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6]21}他的《度关山》、《对酒》等也莫不透射出昂扬之情。曹丕风流儒雅，作品总体上显得文弱，但也并非没有积极奋发的精神，其《艳歌何尝行》云：“男儿居世，各当努力，蹙迫日暮，殊不久留。”^{[5]397}进取之心可谓昭然。围绕在曹氏父子周围的诗人也莫不如是。王粲《从军诗》、陈琳《游览》等无不强烈地抒写自己的积极用世之心。建安诗人的如此情怀，就是在游仙诗中也多有抒发。曹操《精列》“年之暮奈何，时过时来微”^{[6]2}的忧患，《秋胡行》其二“不戚年往，忧世不治”^{[6]8}的感慨，曹丕《折杨柳行》、曹植《五游咏》、《远游篇》、《仙人篇》、《游仙》等，莫不涌动着一种热情、一种功业精神。他们在辞赋、散文中也常常如此，曹丕《浮淮赋》、《述征赋》，曹植《东征赋》、《洛阳赋》、《述行赋》，王粲《登楼赋》等，都很有代表性。可见，建安诗人普遍的进取精神，正是儒家积极入世精神在诗人思想中的深层积淀，这种现象也为我们认识曹植的游侠诗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通过对游侠形象的塑造，建安诗人强烈地抒发了其积极情怀。他们将面对社会、面对人生的激昂情感和游侠刚健勇武的外在特征相结合，其抒情更显浓烈了。

三

从儒家思想切入认识建安游侠诗是符合实际的，建安诗人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深层的儒化现象。虽然从大的思想文化环境来看，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堕落倾颓，不再有往日气象，但它依然以不同于前代的特点或显或隐地存在于人们思想深处，发挥着潜在的影响作用。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置五经博士，把儒学抬高为官学，儒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董仲舒依经立义，坐而论道，开启了儒学经学化道路。建安时期，随着社会的大变动，儒学丧失了其思想统治地位而走向衰败，但是它的影响却深固难徙。《魏略》以董遇、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详等七人为儒宗^{[8]420}，足见儒士依然济济。当时的一些士人在活跃与自由的气氛中，主张越出经学窠臼，寻求儒学的新出路，清除讖纬迷信，一定程度上继承发扬了先秦儒学的积极精神，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下，儒家思想普遍存在于建安诗人身上，曹氏父子便能说明问题。曹氏家族可谓素有儒风，曹操曾祖父曹节“素以仁厚称。邻人有亡豕者，与节豕相类，诣门认之，节不与争；后所亡豕自还其家，豕主人大惭，送所认豕，并辞谢节，节笑而受之”^{[8]1}。曹操祖父曹腾亦承传家风，为人称颂。史载，他自年少时便温良恭谨，历事四帝，未尝有过。“蜀郡太守因计吏修敬于腾，益州刺史种暠于函谷关搜得其笈，上太守，并奏腾内臣外交，所不当位，请免官治罪。帝曰：‘笈自外来，腾书不出，非其罪也。’乃寝暠奏。腾不以介意，常称叹暠，以为暠得事上之节。暠后为司徒，语人曰：‘今日为公，乃曹常侍恩也。’”^{[8]1}曹操的父亲曹嵩也被誉为“质性敦慎，所在忠孝”^{[8]2}。从曹操曾祖父起，三代以来都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他们的敦厚忠孝可为当世楷模。曹操少年时代虽曾放荡不羁，其思想中儒、道、墨、法等融于一体，但相比较而言，深层的儒家思想还是比较稳固的。他“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8]54}。曹植于《武帝诔》中亦言其父“既总庶政，兼览儒林，躬著雅颂，被之瑟琴”^{[3]199}。在曹操的诗文中，称颂周文王、周公、孔子之言语随处皆是。他执政期间，虽贵刑名法令，然严律之下则是体恤民情，力施“仁政”，其《捐河北租赋令》、《收田租令》、《存恤从军吏士家室令》、《复肉刑令》诸篇即是明证。他还以“仁义为名，礼乐为荣”^{[6]8}，力主“修文学”，倡“仁义礼让之风”，以期“先王之道不废”^{[6]32}；他也褒奖忠孝，或称枣祗天性忠能，次称田畴忠武又著，如此等等，在其表、令中多有所见。再者，曹操选拔人才时主张唯才是举，而实际上他所选用的人才多是德才兼备的。曹植在《七启》中就曾赞美父亲“举不遗才，进各异方。赞典礼于辟雍，讲文德于明堂，正流俗之华说，综孔氏之旧章。散乐移风，国富民康”^{[3]12}。基于感情因素，此言或有夸张之嫌，但也很能反映一些问题。另外，就曹操最高的社会理想而言，也表现出颇为鲜明的儒家色彩。他于《度关山》、《对酒》二诗中所热情描绘的“封建五爵，井田刑狱”^{[6]3}，“仓谷满盈，班白不负戴”，“人耄耋，借得以寿终，恩德广及草木昆虫”的“太平时”^{[6]4}，即是源于《孟子》的仁政以及《礼记》的陟方、巡狩、考侯、省农、正刑等事，“其旨言王者德泽广被，政理人和，万物咸遂”^{[9]26}。可以说，曹操有明道、征圣、宗经之迹。曹丕也是从小接受着儒家教育，他“年八岁，能属文。有逸才，遂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8]57}，他曾说自己“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

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10]81}，曹植也言其兄长“歧嶷幼龄，研几六典，学不过庭，潜心无妄”^{[3]342}。曹植“年十余岁，诵读诗、论及辞赋十多万言”^{[8]557}。于此，在曹氏家风可见一斑。围绕在曹氏父子周围的诗人，思想深层也大略相似。

建安诗人多沐于儒学，对于道德修养的追求多受儒家规范影响。儒家重德，在“三不朽”目标中，“立德”即居首位。《论语》中关于“德”及其重要性时有讲述，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1]67}、“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11]146}等。受此濡染，建安诗人对于个人道德修养极为推崇，如曹丕即宣扬“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10]67}。同时，他也严厉批评一些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10]66}。曹植亦云：“无功而爵厚，无德而禄重，或人以为荣，而壮夫以为耻。盖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盖功德者所以垂名也。”^{[10]151}他不光以道德自律，也常以之与朋友互勉，其《赠丁翼》云：“君子义休待，小人德无储。积善有余庆，荣枯立可须。”^{[3]141}《赠徐干》云：“良田无晚岁，膏泽多丰年。亮怀璵璠美，积久德愈宣。”^{[3]42}此外，他对人物的评价也常以道德为重。王粲死后，曹植在其诔文中首先肯定他“既有令德”^{[3]164}即是明显的例子。其他如刘桢所云“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宠珍”^{[1]189}等，都是建安诗人推举道德修养的极好说明。

建安诗人也常有对孔子的倾心推尊。曹植就是一个典型，其《学官颂》序曰：“自五帝典绝，三皇礼废，应期命世，齐贤等圣者，莫高于孔子也。故有若曰：‘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诚所谓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矣！”将孔子视为自古以来天下贤圣之尊，可见顶礼之情。其文云：“由也务学，名在前志。宰予昼寝，粪土作诫。过庭子弟，诗礼明记。歌以咏言，文以骋志，予今不述，后贤曷识。于砾尼父，生民之杰，性与天成，该圣备艺。德伦三五，配皇作烈。玄镜独鉴，神明昭晰。仁塞宇宙，志凌云霓。学者三千，莫不俊艾。惟仁是凭，惟道足恃。钻仰弥高，请益不已。……言为世范，行为时矩。”^{[3]115}从孔子的教育之道、学识、德行以及巨大贡献等各个方面给予高度称颂，表现了对儒学的极大认同。《与杨德祖书》中也有对孔子之盛赞，所谓“昔尼父之文辞，与人流通，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辞”^{[3]154}。此外，像“生荣死哀”、“年在志学”、“玄鉴灵察”、“德美周文”等等，或直出《论语》，或化用其句，这在曹植诗文中相当多。

建安诗人还常常用儒家观点品评人物。曹丕

堪为代表,他赞美徐干“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说应瑒“斐然有述作之意”、说“后生可畏,来者难诬”^{[10]66}等,均是化用《论语》之句。他还说“昔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10]66},直接用孔子哭子路之事来说知音难觅。

此外,建安诗人对于儒家经典《诗经》亦非常重视,有着积极的继承与发扬。他们秉承《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用诗歌反映国计民生,表达了忧生嗟世的强烈感情,辉映后世,令人景仰。不仅如此,他们在诗歌中也往往创造性地借用《诗经》中的成句,或者借用其诗意,或者化用其语句,表达思想情感。如曹操《短歌行》“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6]9},即借用《鹿鸣》抒发思贤若渴之情;《苦寒行》“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6]12},借用《东山》,既写其自比周公之意,又表其体恤百姓之情。又如,曹丕《秋胡行》(朝与佳人期)有“企予望之”^{[5]396}之句,语出《河广》;《秋胡行》有“有美一人,宛如清扬”^{[5]390}之句,语出《野有蔓草》。在曹植的诗歌中,类似现象更是不胜枚举:“昔我同袍,今永乖别”^{[3]173}化用《无衣》“与子同袍”^{[12]173};“昔我初迁,朱华未希,今我旋止,素雪云飞”^{[3]173}仿《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14]229};“庶翱翔以解忧”^{[3]183}化用《羔裘》诗句;“驾言出游”^{[3]183}基本上是《竹竿》中的成句。再如,

王粲《七哀诗》云:“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1]87}《下泉》见于《曹风》,毛诗序说:“《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贤伯也。”^{[13]69}王粲诗中所言之“下泉人”指《下泉》这首诗的作者,也隐指黄泉之下的贤君汉文帝。王粲看见“抱子弃草间”的悲惨景象,回想昔日汉文帝统治下的太平盛世,自然深深理解了《下泉》一诗的作者思念明王贤伯的心情,表达了他对于今日长安混乱景象的不满以及对下层百姓的深切同情。

建安诗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他们虽然很多时候表现出或力行霸道、或崇尚玄虚、或放浪形骸的行为,但是精神主流却依然是儒家思想,因此,从儒家文化出发去解读其游侠诗是合情合理的。

参考文献:

- [1] 俞绍初. 建安七子集[G]. 北京:中华书局,2005.
- [2]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3] 赵幼文. 曹植集校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 [4] 李泽厚. 美的历程[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 [5] 逯钦立.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G].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6] 曹操. 曹操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7]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8]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9] 丁福保. 历代诗话续编[G].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0] 严可均. 全三国文[G].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11]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2] 高亨. 诗经新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13] 陈奂. 诗毛氏传疏[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责任编辑 韩云波

The Jian An Errant Knight Poems and Confucian Spirits

LIU Fei-bin

(College of Literatur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6, China)

Abstract: The errant knight poems began in the Jian An period. The limited number of these surviving poems was the embodiment of the factual portrait and ideal alteration of the images of the errant knights. The poems praised the errant knights too highly. In fact, the essence of their action was to express their active spirit of entering the socie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Although the poets uphold overbearing, hypocrisy or dissoluteness and unrestraint, their mainstream thoughts are Confucian. So, it is proper and reasonable to interpret the Jian An errant knight po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ucianism.

Key words: Jian An; Errant knight poems; the active spirit; the Confucian spirits